

# 弗洛姆对美好生活的研究及其启示

陈学明

**【摘要】**贯穿在弗洛姆的理论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对美好生活的研究。这一研究对于正在致力于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疾步前进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的中国人民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首先,弗洛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目标的论述启发我们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奋斗目标。其次,弗洛姆关于人的本性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确定美好生活的内涵。第三,弗洛姆对“存在”与“占有”两种生活方式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美好生活的根本标准。第四,弗洛姆把“工作”与“爱”作为实现美好生活的途径,为我们探索如何走向美好生活提供了借鉴。最后,弗洛姆把美好生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启示我们在实现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地对待自由。

**【关键词】**美好生活;人的本性;存在与占有;工作与爱;自由

**【作者简介】**陈学明,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出处】**《国外理论动态》(京),2021.3.32~4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微观研究”(20FKSA0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关系及其当代重大问题研究”(20&ZD028)的前期成果。

去年是西方著名精神分析学家、社会哲学家、“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诞辰120周年、逝世40周年,世界各地陆续举行了纪念他的活动。弗洛姆的理论十分庞杂,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对美好生活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对于正在致力于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疾步前进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的中国人民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可以说,研究、消化和吸收弗洛姆的理论在中国正当其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为什么还要明确把追求美好生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我们所要追求的美好生活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说我们当下的生活还不那么美好?究竟如何去追求美好生活?这些问题对于正在追求美好生活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必须正确回答的问题,而弗洛姆的相关理论能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一定的启示。

## 一、弗洛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目标的论述启发我们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奋斗目标

弗洛姆在许多著作中,特别是在他诠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的小册子中,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质及目标进行了深入阐述,旨在提醒我们,人应当把自身作为追求的目标,应当围绕满足自身的需求展开自己的全部活动。

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究竟何在?弗洛姆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一种抗议,抗议人的异化,抗议人失去了自身,抗议人变成了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始终是人,其核心问题就是现实的存在问题,即人应当按照自己的“本性”展现在历史之中,“使人的完整的人性得到解放,使人与其伙伴们以及与自然界处于统一而且和谐的关系之

中”，“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恢复人使他自己与别人以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能力”。<sup>①</sup>弗洛姆还强调，马克思主义把人本身作为自己的目标是由其唯物史观决定的，因为唯物史观对历史的理解是建立在人是“自己的历史的创造者和运动者”这一事实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一再指出，德国哲学是“从天上降到地上”，而他则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其主要标志就是把“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作为“出发点”和主要目的。<sup>②</sup>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把人作为目的的思想与“康德关于人必须永远是自在的目的而决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的原则”相接近，并进一步发展了康德的原则，不仅一般性地提出人不能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且还强调“人的人类本质一定不能变成达到个人存在的手段”。<sup>③</sup>

弗洛姆指出，“马克思的目标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建立在他关于人的学说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使个人的个性得到发展”，“社会主义是一个允许人得以通过克服自己的异化而实现自己的本质的社会”，它将“使得生活本身成为他的主要活动，而不是以生产谋生手段为主要活动”。<sup>④</sup>当人类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时，就意味着已经建立了一种合理的、非异化的社会形式，也就有机会开始发展属于人的生活目的的方方面面。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是一个以人为目的、以满足人的真实需要为宗旨的社会，但“决不是那样一种生活的圆满完成，而是保证那样一种生活的圆满完成的条件”<sup>⑤</sup>。弗洛姆特别推崇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社会主义前景的描述：“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sup>⑥</sup>他认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前景的这一看法是建立在他对人的信念的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实现了人向自身的复归，完成了存在与本质的统一，克服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裂和对抗，使自然人性化；它意味着这样一个世

界，在那里，人不再是许多陌生人中的一员，而是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在论证马克思主义把人本身作为目标时，弗洛姆还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从未把物作为追求的目标。他认为，通读马克思的全部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印象，在马克思那里，目的始终是人而不是物。马克思当然也常常提及物质产品或生产力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把这些“物性”的东西作为人应当追求的目的本身，而只是把它们视为实现人本身这一目的的手段。在马克思那里，把人本身作为目的时，始终有一个对立面存在，即把物作为目的。而把物作为目的的结果就是：“不仅物的世界变成人的统治者，人所创造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变成了他的主人。”<sup>⑦</sup>

弗洛姆认为，如果社会主义社会也停留于把物作为目的，就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了。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也谋求创造和增加物质财富，但其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用这些物质财富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如果把社会主义也变成一个以追求物质为目的的社会，在物质追求的背后又没有一个更崇高的目标，没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那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呢？弗洛姆指出：“某些人对马克思的目标以及对他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内容所作的那种描述，几乎完全适用于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在那里，大多数人都是被力图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获得舒适而又新奇的什物这样一种愿望所推动，这种愿望只受到一种限制，即希望安全稳妥，不要冒风险。”“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情景，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反对者给这种社会主义描绘的那幅漫画，几乎没有任何区别。”<sup>⑧</sup>在弗洛姆看来，由于马克思把人而不是物作为目的，从而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鲜明地区别开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部批判，恰恰就是因为资本主义把对金钱和物质利益的关心变成了人的主要动力”<sup>⑨</sup>。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将生产方式视为第一性的，有些人由此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围绕生

产方式来规划人的行为,并进一步推论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把追求物质利益作为人的主要目的。这种看法成为解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种“流行观念”。“这种流行的观念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最强烈的动机就是想获得金钱,获得更多的物质享受;如果这是人的主要推动力,因而使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继续下去,那么理解历史的关键就是人的物质欲望。”<sup>⑩</sup>按照这种理解,就必然会把追求物质利益作为人的主要动机和目的。弗洛姆认为,这显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曲解。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生产方式决定人们的思想和欲望,但它并不认为人们的主要欲望就是想要获得最大的物质利益。

弗洛姆在强调社会主义必须以人本身为目的、必须为实现人的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同时,反对把物质及其消费作为生活的中心,认为实现美好生活并不是反对征服贫困,恰恰相反,消除贫困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要条件,是创建美好生活的起点。他说:“马克思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既要征服贫困,又要反对把消费作为最高目的。”<sup>⑪</sup>

作为一位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质与目标的阐述,以及他关于人类必须把自身作为最高目标、为实现自身的美好生活而奋斗的论证,存在诸多问题甚至错误。比如,在他那里,人往往是抽象的;再如,他将人与物完全对立起来,从而将美好生活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对立起来。尽管如此,他的论述仍然启示我们,必须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特别是他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阐述了必须把实现人本身作为最高目标的理论依据。这些论述值得我们借鉴。

## 二、弗洛姆关于人的本性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确定美好生活的内涵

弗洛姆将美好生活与实现人的本性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要认识什么是人的美好生活,关键是要明确什么是人的本性,凡是能够实现人的本性的生活就是美好的,反之,凡是有违人的本性的生活

就是痛苦的。所以,所谓美好生活就是能够实现人的本性的生活。

弗洛姆认为,正如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从人的概念中推导出来的一样,人的真正需要及其相应的美好生活概念也是植根于人的本性的。因此,只有依据对人的本性的认识,才能区分出人的真正需要与虚假需要,区分出什么样的生活是美好的,以及什么样的生活并不美好。

弗洛姆根据人本主义伦理学原则进一步指出,有益的就是善,有害的便是恶;符合人的本性就是对人有益、就是善,违反人的本性就是对人有害、就是恶。而为了搞清楚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善的、美好的生活,就必须了解什么是人的本性。古往今来,一切思想家之所以孜孜不倦地研究人性,都是为了探求一个“定向和献身的框架”,确定什么样的生活是应当追求的、真正有益的,从而也是善的、美好的生活。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弗洛姆的理论的首要主题就是对人的本性的研究,而他之所以如此执着地探讨人的本性,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确立人的美好生活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

弗洛姆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本性就是人的本质,这与其在历史上存在的各种特殊形式显然是不同的。例如,有人把利己主义和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视为人的本性,但实际上,利己主义仅仅是人的本性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能把这种特殊形式视为人的普遍本性,它充分显示了人的本性的相对性,即人的本性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否定人具有普遍的本性。弗洛姆指出:“虽然马克思后来不再使用‘本质’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是抽象的和非历史的,但是,马克思以一种更加符合历史变化的形式,在‘人的一般本性’和每个时代‘变化了的人的本性’之间的区别中,显然保留了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sup>⑫</sup>

那么,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性”究竟是指什么呢?弗洛姆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指出,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本性就是人

的自我能动性,马克思的这一主张继承和发展了斯宾诺莎、歌德和黑格尔等思想家的理论。他认为,在斯宾诺莎的伦理体系中,已经可以看到对人的能动性的重视。斯宾诺莎将人的情感分为两类,其中第二类情感是积极的、自由的和生产性的情感,与人的本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歌德将人的生产能力作为其哲学关注的中心,弗洛姆转引《浮士德》中的一段话来说明歌德“对于生产能力的思想给予了最富有诗意的最有力的表述”：“既不是财产和权力,也不是感性的满足,能实现人对人生的意义的期望;在这一切中,人依然跟整体相分离,因此人依然是不幸的。只有在生产性的活动中,人才能使人生有意义,虽然他在这一过程中享受人生,但绝不贪婪地想保住人生。”<sup>⑧</sup>而黑格尔哲学则最系统、最深刻地阐述了“生产性的人”的思想: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他在生产活动中把握世界,从而使世界成为他自己的世界;个人之所以成为生产性的人,是因为他并非消极被动的,而是能动地与世界发生关系。黑格尔强调,只有持续不断的活动才有可能使个人的力量、能力和潜力得到发挥,这是纯粹的沉思和感受所无法做到的。弗洛姆总结道:“斯宾诺莎、歌德、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认为,人之所以是活生生的,只是因为他进行生产活动,因为他在表现自己的特殊的人类力量的活动中、在他以这些力量掌握世界的活动中掌握了那个处于他自身之外的世界。如果人不进行生产活动,如果人是消极的、被动的,那么他就什么也不是了,他就死了,在这种生产活动的过程中,人实现了他自己的本质,恢复到他自己的本质中去,用神学的语言来说,这无非就是复归于上帝。”<sup>⑨</sup>

在将人的自我能动性视为人的本性的基础上,弗洛姆进一步将爱视为人的本性,在他看来,将自我能动性、生产性视为人的本性,与将爱视为人的本性是一致的。他指出,应当把自我能动性理解为一种趋势,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一种激情,而在马克思那里,人的激情“是一个精神饱满地为自己目标而奋斗的人的本质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激情就是“爱”;“当我们读到马克思如何把生产力这一概念运

用到爱这种现象时,就更容易理解这一概念与被动性概念是相对立的了”。<sup>⑩</sup>弗洛姆认为,富有激情的爱充分体现了主、客体之间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如果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合乎人的本性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必然会用爱来交换爱,用信任来交换信任,而这样做的前提是,人本身必须是一个能鼓舞和推动他人前进的人。他说:“在与对象世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通过人自己的力量,外部世界对人来说成为实在的,而且实际上只是由于‘爱’才使人真正相信人之外的那个对象世界的实在性。”<sup>⑪</sup>

弗洛姆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把人的自我能动性作为人的本性,实际上就是把劳动作为人的本性。只有联系到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概念,才能充分理解其关于人的自我能动性的理论。在他看来,劳动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决不仅仅是经济学范畴,而且还是本体论范畴,在这一范畴中隐含着马克思对人的本性的界定。对于马克思来说,劳动是一种活动,即人的自我创造活动,劳动的最基本属性就是自我能动性。正因为劳动体现了人的本性,是人的自我实现,是人的体力与智力的表现,所以“在这一真正的活动过程中,人使自己得到了发展,变成为人自身”,“劳动不仅是达到目的即产品的手段,而且就是目的本身,是人的能力的一种有意义的表现”,“因而劳动就是享受”。也正因为马克思把劳动视为人的本性,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实现美好生活的关键就是“要使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变成生产的、自由的劳动”。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之所以批判资本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在财富分配方面不公平,使工人群众处于贫困之中,而推翻资本主义就是为了使财富分配趋于公平,“使工人获得资本家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弗洛姆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主要批评不在于资本主义的财富分配不公正,而在于资本主义使劳动堕落为被迫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因而使人变成‘残废的怪物’”。<sup>⑫</sup>只有劳动获得了解放,人才能真正过上属于人的美好生活,因此人的美好生活的核心就是劳动的解放。

弗洛姆把对美好生活的界定与人的本性联系在一起、认为所谓美好生活就是能够实现人的本性的生活的思想,应当说是一种富有哲理的深刻见解。而他把人的本性归结为人的自我能动性、归结为劳动的看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他关于把是否能发挥自我能动性、是否能让劳动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活动作为确定美好生活的主要依据的主张,也为我们探索美好生活的内涵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 三、弗洛姆对“存在”与“占有”两种生活方式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美好生活的根本标准

弗洛姆在其最后一部著作《占有还是存在》中提出并区分了人的两种生活方式,据此引导人们追求一种“存在”而非“占有”的生活方式。他认为,依“常识”来看,占有是生活的常态,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占有物品,进而才能享用它们,因此人的存在的本质就是占有。马克思则教导我们,奢侈与贫困一样是一种罪恶,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存在得更好,而不是占有得更多。<sup>⑧</sup>

弗洛姆对占有的生活方式进行了详细描述。他认为,占有在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中处于主导地位,“贪婪地谋取、占有和牟利成了工业社会中每一个人神圣的、不可让渡的权利”<sup>⑨</sup>,人的自我塑造和构建必须依赖占有,财富成为证明拥有者力量的象征,至于财富如何获得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财富与义务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只要不触犯相关法律,人就拥有无限而绝对的权利去占有和支配财富。这种生活方式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对分享的排斥,为了获取和守住自己的占有物,占有者不惜与他人对抗,不允许旁人共享他的占有物。实际上,主体一旦获得了占有物,在使用过程中也就无须再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这种生活中,占有的一切均为死物,人与占有物之间的关系是僵化的。乍看起来,人似乎拥有了一切,但实际上却一无所有,因为人所占有的和所统治的对象都是生命过程中暂时的瞬间。从另一个角度看,人所拥有的物也占有了人本身,这是因为人在这种处境下的存在是以物的存在为基础的,

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必须尽可能地去占有。这种以占有为主要特征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人的异化,主体没有了任何创造力,更不要说创造性。更为严重的是,在占有的基础上,人们还要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占有的东西增殖,以便从中获取更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占有会使人向“非人”的方向发展。在一个重视占有的社会中,并非只有富人才秉持占有的生活方式,即使穷人也往往以占有为生活方式。弗洛姆特别指出,占有并非一种“富有”的生活方式,因为通过这种生活方式所拥有的富有生活是以牺牲人的精神、导致人异化为前提的,因而是一种“贫乏”的生活方式,而“与富有的人这一概念相对应的是马克思关于拥有感和存在感之间差别的观点”<sup>⑩</sup>。

弗洛姆还将占有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占有这一生活方式的本质根源于私有制的本质。”<sup>⑪</sup>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们唯一信奉的是据物为已有,并且一旦占有就可以永远将其保持下去。他特别引用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它们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受都被这一切感受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受所代替。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它的内在丰富性。”<sup>⑫</sup>

弗洛姆还指出,只要处于占有的生活方式下,人们就不仅可以将金钱、财富、艺术品等有形之物作为占有对象,而且还可以将友谊、爱情、健康等无形之物纳入占有范围。就整体而言,占有的生活方式无孔不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人们至今一直处于占有的生活方式之下,因此对可称之为“存在”的另一种生活方式知之甚少。但是,实际上只有“存在”才能给予人们真正美好的享受,从而才

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

在弗洛姆看来,这种美好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人的“真实的存在”,“它与虚假的、幻想中产生的图像相反”。“我的行为能部分地反映我的存在,但它通常是我所拥有的、并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佩戴的一副假面具。”如果说“占有的存在”是“表面现象”,甚至是“虚假”的存在,那么“真实的存在”则是体现了人的真实人性、实现了人的真实需求的存在。它是一种“内在的实在”,尽管这种实在往往无法被意识到,也不能被直接观察到。这种“没有伪装”的存在概念乃是“斯宾诺莎和马克思思想中的主要观点”。<sup>②</sup>

在这里,弗洛姆想要强调的是,存在的生活方式根植于人的潜能,根植于人的给予、分享和勇于牺牲的愿望。他指出:“我们人类生来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的欲望:要表现自己的才能,要积极主动,与他人发生联系,逃避自私的樊笼。”<sup>③</sup>在他看来,尽管当今大多数人表现出自私的行为方式,但我们仍然可以在护士、医生、僧侣、修女等职业人群中发现人具有献身和同甘共苦的需要,以及甘愿为他人牺牲的精神。他反复强调,体现“存在”这种生活方式的主要倾向是分享、奉献和牺牲的倾向,“其力量根源于人类生存的特殊状况和人渴望通过与他人的统一来克服自身孤独感的内在需求”<sup>④</sup>。

弗洛姆认为,存在的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特征就是主动性。这里所说的主动性不是“外在的主动性”,而是“内在的主动性”;不是被动的忙忙碌碌,而是“自我的更新、成长、才气横溢、爱、对一切感兴趣”以及“富有牺牲精神”。这种生活方式的先决条件就是“独立、自由和有批判精神”。<sup>⑤</sup>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下,人们不再抓住其所占有的东西不放,也不再心安理得地坐享其成,更不会通过迷恋占有物来寻求安全和地位,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上是要求人们放弃自我中心,抛弃自私心理。弗洛姆承认,对一般人来说,要抛弃占有的心理、进入真正的存在状态实在是太难了,“任何放弃这一倾向的尝试都会使他们心急如焚,感到自己似乎失去了一切安全的保障,被抛进了无边无际的大海”。但是,弗洛姆同时

指出,一旦他们抛弃了“占有”、特别是“占有财产”这种生活方式之后,“就可以运用他们自身的力量独立行走了”。<sup>⑥</sup>

弗洛姆认为,当人们真正处于存在的生活方式之下时,就意味着他们成为了“新人”。他将“新人”的特征具体描述为:相信自己的存在,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安全感、同一感和信心;承认除自己外,没有任何人或物会赋予生命以意义;从给予和分享而不是积聚财物和剥削中获得快乐;尽一切可能消除贪欲、仇恨和幻想;培养爱的能力以及批判思维和理性思维;让自己和同胞得到全面发展,并使之成为生活的崇高目标;发挥想象力,预先考虑切实可行的办法,努力改变而不是逃避不堪的现状;既不欺人,也不为人所欺;可以做一个天真无邪的人,但不可做一个幼稚无知的人;意识到自己与一切有生命之物的统一性,从而放弃对自然的征服、掠夺或摧残,努力认识自然,同自然通力合作;在充满生气和活力的不断发展中争取幸福。在这里,弗洛姆所描述的“新人”的主要特征实际上就是“存在”这种生活方式的主要内涵。

人的生活是否美好,确实需要有客观标准,而弗洛姆把“占有”与“存在”作为区分生活是否美好的根本准则,这种区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现代社会所造就的“占有式个体”在一定程度上使人获得了相对独立性,并确保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但是,这种追求无疑会导致个体丧失自我,进入“失范”状态,因此绝不属于美好生活。一些思想家认为,应创建新的生活,用“关系性个体”来代替“占有式个体”。弗洛姆则根据马克思的相关论述,用真正的“存在”来表述这种替代“占有”的新生活方式。这对于我们把握美好生活的根本标准富有启发意义。

#### 四、弗洛姆把“工作”与“爱”作为实现美好生活的途径,为我们探索如何走向美好生活提供了借鉴

在弗洛姆的许多著作的扉页上,都写有“工作”(work)与“爱”(love)这两个单词。这是他要人们通过努力的工作和尽情的爱来创建自己的美好生活。他之所以把“工作”与“爱”作为实现美好生活的主要途

径,是因为在他看来,两者能够满足人的最根本的需求,而人的根本需求又产生于人的生存处境。

在《寻找自我》一书中,弗洛姆认为,在所有的动物中,人是最软弱无能的,是在偶然的时间和偶然的地点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是唯一这样的动物:对人来说,其生存也成了一个问题,成了一个必须解决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人的生存经常处于不可避免的不平衡之中”<sup>⑧</sup>。他通过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分析揭示了人类生态所固有的矛盾,他称之为“生存的两歧”。他认为这种“生存的两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生存的两歧”是生与死的两歧。死与生总是对立的,总外在于生,而又不能与生共存。面对死,人只能正视,别无选择。“人一定要死,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人能认识到这一事实,并且正是这种对死的认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生活。”<sup>⑨</sup>人企图通过创造某种意识形态来否定生与死的两歧,例如,通过创造基督教的灵魂不死概念、假定存在永生的灵魂来否定一个残酷的事实:随着人的生命终结,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其次,“生存的两歧”是潜能的实现与生命的短暂的两歧。虽然每个人都拥有人类所具有的一切潜能,但由于其生命是短暂的,所以即使在最有利的环境下也不可能完全实现这些潜能。“人的生命从其诞生到死亡,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一刹那,但从其愿望来说,总渴求能实现他所有的潜力,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sup>⑩</sup>人对这种“他认为能够实现”与“实际上能够实现”之间的矛盾至少会有所感觉,但他的意识却通过假想人死后生命可以继续或假想他所处的历史阶段是人类最终和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来调和、否定这种矛盾。

最后,“生存的两歧”是个人化与孤独感的两歧。人从母体诞生后不断成长的过程就是个人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增强了自我的实力,使人日趋自由;另一方面又切断了他与周围环境缔结的原始纽带,使人失去了安全感、互联感,滋生了孤独感。“他之所以是孤独的,是由于他是一个独特的整

体,与其他人都不一致。”当人不得不靠自己的理性力量作判断、作决定时,他必然是孤独的,而可悲之处正在于“他的幸福与否恰恰就取决于他能否感受到与其同胞、先辈和后代心心相印”。<sup>⑪</sup>

弗洛姆认为,上述三种“生存的两歧”是人生存的必然组成部分。但是,人决不会甘于生活在这种内在的矛盾之中,他必然会追求和谐、美好的生活,于是就产生了各种需求。这些人类所特有的需求就根植于其“生存的两歧”之中。“人类生存的失调,导致产生了远远超出其动物性欲念范围的种种需求。这些需求变成了一种力图恢复他自身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的统一协调的强制性驱力。”人是一个既有精神又有肉体的整体,所以他就不仅通过思维、而且通过生活过程,不仅通过感觉、而且通过行动,对其“生存的两歧”做出反应。弗洛姆认为,人往往具有某种目标、理想或上帝般的“超人的力量”,这种“超人的力量”“是在生活过程中追求完满性这种需求的表现”。<sup>⑫</sup>弗洛姆还列出了人所特有的种种需求,其中最主要的需求是对“超越”和“关联”的需求。

所谓对“超越”的需求,指的是人渴望超越被动的生存环境,它产生于“生与死的两歧”和“潜能的实现与生命的短暂的两歧”。面对这两种困境,人不甘成为环境的奴隶,总是力图由被动的角色转为主动的角色。如前所述,人总有追求“定向”和“献身”的趋向,这种趋向实际上就是“超越”的需求。他说,由于缺少合适的字眼,“我姑且把这种需求称为‘定向’和‘献身’的框架”<sup>⑬</sup>。因为这种需求是人的生存所固有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这种需求如此强烈,在人身上再也没有比这种需求更强大的力量源泉了。

所谓对“关联”的需求,指的是人渴望与同类建立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它产生于“个人化与孤独感的两歧”。处于这一困境中的人害怕孤独,迫切需要与他人发生关联,以使自己从孤独中解脱出来。这种需求与对“超越”的需求一样,同样深深扎根于人的生存状态之中,同样构成了人的强大动力源。弗洛姆认为,对“关联”的需求实际上也就是对

“爱”的需求。人们祈求爱,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与爱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对爱的需求是根源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最基本需求,所以爱的唯一重要性就在于爱本身,爱是人类的自我表达,是使人的力量得到充分发挥的方式。弗洛姆还强调指出,作为人的最基本需求的爱是广义的,它意味着爱所有的人、爱生活、爱世界,只要是能消除其孤独感的行为,都是爱的行为。

那么如何才能满足人的这两大需求呢?或者说,如何通过满足这两大需求使人获得真正美好的生活呢?弗洛姆认为,满足人对“超越”的需求的最好途径就是“努力地工作”。对“超越”的需求是人所共有的,但满足这一需求的途径则有所不同,“这些区别属于价值观上的区别”<sup>③</sup>。凡是人格发展不健全的人,必然会回到“原始的、非理性的”方向上去,而这一方向反过来又助长并增加了他的依赖性和非理性。而成熟的、理性的和具有创造性的人将选择能促使他真正消解“生与死的两歧”和“潜能的实现与生命的短暂的两歧”并能满足其对“超越”的需求的途径。这一途径就是让自己处于努力工作的状态,不断展现自己内在的潜能,“把培育和发展自己的所有潜力作为唯一的目标,使自己所有的其他活动都从属于这一目标”。<sup>④</sup>在弗洛姆看来,人是一种能运用其理性和想象改造现有世界的“具有创发性的存在物”,“创发性是人的能力所在,是一种使用自己的力量和实现自己的固有潜力的能力”。通过努力工作,人在“创发性”之中“体验到了自己是其力量的体现者和‘行动者’”,“感觉到了自己是一个强者,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没有受到阻碍和遭致异化”,从而从“生与死的两歧”和“潜能的实现与生命的短暂的两歧”中摆脱出来。<sup>⑤</sup>

弗洛姆还认为,满足人对“关联”的需求的最好途径就是“尽情地爱”。一切时代、一切文化中的人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满足对“关联”的需求,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途径“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结合,在于同他人的融合,在于爱”。<sup>⑥</sup>在弗洛姆看来,这种“爱”应当是尽情的,作为人的生命一种积

极主动的力量,它能够突破人与同胞之间的隔阂;而“尽情”又必然是主动的,是人的一种积极活动。“爱是主动的活动,而不是被动的倾向,它是‘站立于’而不是‘坠入’。以最通常的说法,爱的主动性可以用这样的陈述描述出来,爱的首要意义是给予,而非接受。”<sup>⑦</sup>所谓给予,并非放弃、被剥夺或牺牲,而是一种能力的最高表现。在给予中,个体体验到力量、满足和能力。这种充盈的、高涨的生命力之所以比接受更令人喜悦,就是因为它一方面表现出我们的活力及对生命的肯定,另一方面又促使我们解除孤独。弗洛姆十分赞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sup>⑧</sup>

弗洛姆强调,通过“努力地工作”和“尽情地爱”去满足自己对“超越”和“关联”的需求的过程,就是人类创造美好生活、获取无上快乐的过程。他认为,幸福、快乐是“生活艺术达到完美化的标志”<sup>⑨</sup>,而唯有“努力地工作”和“尽情地爱”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人类如果真的致力于“努力地工作”和“尽情地爱”,就说明人类已经找到了回答生存问题、破解“生存的两歧”的答案。

对于弗洛姆论证“工作”与“爱”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主要途径的整个思路,我们可以提出质疑,也可以不接受他对人的生存处境和人的基本需求的分析,但必须承认,他把“努力地工作”和“尽情地爱”作为实现美好生活的主要途径,强调人们在“工作”和“爱”中会获取无上快乐,是一种真知灼见。为了创造美好生活,我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多,而从“努力地工作”和“尽情地爱”入手不失为一种良策。

**五、弗洛姆把美好生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启示我们在实现美好生活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地对待自由**

美好生活总是与自由联系在一起。“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些名言警句充分展现了自由在美好生活中的地位。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弗洛姆高度肯定了自由对于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性,认为人类争取

自由的历史就是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他指出：“近代欧英历史的要旨就是谋求摆脱人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枷锁。渴望新自由的被压迫者向维护特权的人们发动了争取自由的战争。当某一个阶级为使自已从统治下获得解放而斗争之时，它自以为是在为整个人类的自由而斗争，从而可以诉诸某种理想，藉以唤起深埋在所有被压迫者心中的对自由的向往。”<sup>④</sup>弗洛姆列举了人类争取自由的斗争所带来的种种美好：“不自由，毋宁死”这一舍生取义的信念展现了人格的美好；能够自由地思想和感知使得人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出来；人的自治和自决促进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宗教自由以及私人生活的发展；人类通过逐步推翻大自然的统治摆脱了自然的束缚，通过推翻教会的控制和专制国家的主宰成为自己的主人，等等。

但是，在弗洛姆看来，自由对于人的意义是双重的，既有促进美好生活的一面，也有给人带来痛苦的一面，“它们使人发展了个性，但同时又使人孤独无援；它们增加了人的自由，但同时又创造了一种新的束缚”<sup>⑤</sup>。因此，要研究自由与美好生活的关系，就必须研究这种双重意义。而要让人们、“特别是让那些已被自由迷了心窍的人”承认自由还有消极的一面，确实是一件难事。弗洛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充分地展现出自由对于人的这种双重意义。他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商品、人与人、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出发，具体论述了人的自由本身便意味着不自由。

首先，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由体现为与自然作斗争的能力增强了，即在自然领域变得自由了，但正是这种自由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原始同一性，切断了两者联系的纽带。从表面上看，这可以使人少受或不受自然界的束缚，但与此同时，人也失去了大自然这个重要伙伴，甚至还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导致孤独感、惶恐感和不安感油然而生，这正是对人类在自然界面前充分享用自由的惩罚。正如弗洛姆所说：“尽管人在统治自然方面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至今社会还不能有效地控制它

所创造的力量。”<sup>⑥</sup>

其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由集中体现为买卖自由，人们可以自由地制造商品，也可以自由地买卖商品。但是，这种买卖自由的结果就是把人交给了商品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像一个为赚钱而赚钱的机器，个体就像这个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其重要性取决于掌握资本的多寡。人们往往相信他自己的行为是出于自我利益的动机，可实际上却被自身之外的目标所支配。为自身之外的目标奉献自己，这是人不自由的最主要标志。如果说以前人们将自己奉献给上帝，那么今天则将自己奉献给现代经济制度。这种情况必然导致这样一种状况：人制造了商品，商品却成了人的上帝；人创造了世界，世界却成了人的主宰。总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使人为了某种超越自己的目的而劳动，成为他所制造的机器的奴仆”<sup>⑦</sup>。

再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由还表现为可以不受约束地面对他人，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减少、关系的疏远。这种自由使人断绝了与他人的正常交往，感受到极度的精神孤独。“现代人所具有的那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形式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孤独感和软弱无力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丧失了那种坦率的、符合人性的特征，而是渗透着互相利用、互相操纵的精神。”<sup>⑧</sup>资本主义社会让每个人都完全依靠自己，你要做什么，怎样去做，成败得失，都是自己的事。这种现象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日益减少，甚至还会为了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既然现代人已经非人化、物化、机器化和商品化，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变成了非人的关系、物的关系、互相利用的关系和商品交换的关系。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即使一个人再自由，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争斗、冷酷无情的世界，他当然会感到势单力薄、微不足道。这是人最害怕的一种境遇，但是现代人恰恰就处于这种境遇之中。

最后，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被人看重的自由或许就是政治领域的自由，而政治自由发展的最大成果就是建立了现代民主国家。政治领域的自由权

说到底就是个人可以自由地直接参与投票,但这是一种真正能够代表民意的自由投票吗?弗洛姆认为,只要看下述事实就一清二楚了:一是投票人会受到大党的干扰,这些大党就像庞大的工业组织一样,会对个人产生巨大影响,进而左右选举过程;二是投票人往往无法搞清需要投票表决的事项的来龙去脉;三是投票人在他所拥护的候选人当选后就失去了控制该候选人的最后手段。政治领域的自由最终带给人的消极影响甚至比经济领域的自由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更严重。“经济活动方面的广告宣传使消费者滋生了无足轻重感,同样,政治活动方面的政治鼓动也使选举人深感自己渺小无比。喋喋不休地重复政治口号,反反复复地宣传那些早已听腻了的主题,只能麻木人的批判能力。”“选举人面对着靠政治鼓动得以维持的党的巨大力量和声望,不禁相形见绌,不寒而栗。”<sup>⑧</sup>

弗洛姆据此提出:“资本主义不仅给人带来新自由,还使新教的宗教自由在个人心理上造成的创伤进一步加强了。个人变得更加孤独、彷徨,更加成了在自身之外的某种超级力量手中的工具。”<sup>⑨</sup>他指出,只要详细分析宗教改革以来的欧美历史,就不难发现“在自由中获益”与“在自由中受害”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是怎样平行发展、不断交织在一起的。

弗洛姆关于自由对于人的双重意义的论述,旨在进一步说明存在于人性之中的追求自由与逃避自由两种内在驱动力之间的对立。在他看来,现实社会中表现出来的自由的双重意义根源于人类挥之不去的“追求自由”与“逃避自由”的双重愿望,正是这种内在的双重驱动力导致了现实社会中人对自由的这两种截然有别的倾向。我们考察人性,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考察人对自由的两种不同的内在倾向。人除了有向往自由的内在愿望,也会有顺应屈从的本能愿望,否则就无从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地屈从于权威,而且还通过屈从获得了一种神秘的、难以名状的满足。

一方面,人性中存在着追求自由的驱动力。另一方面,人性中也存在着逃避自由的驱动力。个体的成

长不仅形成了追求自由的心理机制,而且形成了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逃避自由的冲动与追求自由的冲动一样,既伴随着个体的成长过程,又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对人来说,逃避自由、寻求归属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想。具有这种梦想的人,“他们并不固执己见,不做自己想做的事,一心一意听从外在力量的指挥”,“他们也很少去体会一下‘我要’或‘我是’这种感觉是什么滋味”,“在他们看来,生活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既无法主宰也无法去控制”。<sup>⑩</sup>

正因为弗洛姆认为人性中存在着追求自由与逃避自由这两种截然对立的驱动力,所以他顺理成章地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这两种驱动力、实现它们之间的平衡的问题。他指出,一个人的生活是否美好,一个社会是否健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正确地对待追求自由与逃避自由这两种挥之不去的梦想。他说:“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成为自身的可能性;自由并不是一大堆贪婪的欲望,而是一种巧妙的稳定结构,它随时都面临兴与衰、生与死的选择。”<sup>⑪</sup>他强调,平衡好追求自由与逃避自由这两种心理机制,其实也就是争取“积极的自由”的过程。自由有消极与积极之分,“消极的自由”充其量只是一种“解脱”,而“‘解脱’与积极的自由、与‘自由自在’并不是一回事”。“向‘积极的自由’方向发展”,“借此表现自己的情感、感性和理性方面的能力,在不放弃自我尊严和独立性的前提下实现自己、自然和他人三者之间的融合”,才是我们必须做的。弗洛姆要我们相信,“总有一种积极的自由状态存在”,“发展自由的过程并不构成一种恶性循环,人完全可以做到,既自由又不孤独,既具有批判的眼光又不怀疑一切,既独立又不与世界隔离”。<sup>⑫</sup>当这种积极的自由形成之时,也就是人类的美好生活创立之日,美好生活永远与积极的自由而不是消极的自由联系在一起。

弗洛姆把创建美好生活与正确对待自由联系在一起,指出展现自由的过程对于人具有双重意义,揭示了人具有追求自由与逃避自由两种截然有别的心理机制,希望人们通过平衡这两种心理机制变消极

的自由为积极的自由,从而走向美好生活。这些论述言之成理。所以,尽管他关于自由问题的论述与他的其他理论一样,存在着矛盾与不能自圆其说之处,但总体来说还是能给予我们莫大的启示,特别是启发我们在为实现美好生活而奋斗的过程中务必要密切关注、正确对待自由问题。

注释:

①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载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

③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第65页。

④同上书,第23、52、71页。

⑤同上书,第7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⑦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第64页。

⑧同上书,第22页。

⑨同上书,第31页。

⑩同上书,第29页。

⑪同上书,第51页。

⑫同上书,第40页。

⑬同上书,第43页。

⑭同上书,第44页。

⑮同上。

⑯同上书,第47页。

⑰同上书,第55页。

⑱黄颂杰主编:《弗洛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07页。

⑲同上书,第617页。

⑳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第49页。

㉑黄颂杰主编:《弗洛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第625页。

㉒《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9—190页。

㉓黄颂杰主编:《弗洛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第631、628页。

㉔同上书,第632页。

㉕同上书,第635页。

㉖同上书,第627页。

㉗同上书,第628页。

㉘弗洛姆:《寻找自我》,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

㉙同上书,第54页。

㉚同上书,第55页。

㉛同上书,第55—56页。

㉜同上书,第60—61页。

㉝同上书,第62页。

㉞同上书,第64页。

㉟同上书,第105—106页。

㊱同上书,第108页。

㊲Erich Fromm, *Art of Loving*, London, 1982, p. 22.

㊳Ibid., p. 25.

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47页。

㊵弗洛姆:《寻找自我》,第246页。

㊶弗洛姆:《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㊷同上书,第141页。

㊸同上书,第159页。

㊹同上书,第151页。

㊺同上书,第160页。

㊻同上书,第174页。

㊼同上书,第162页。

㊽同上书,第189页。

㊾黄颂杰主编:《弗洛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第643页。

㊿弗洛姆:《逃避自由》,第53、186、333页。